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提高应急处突能力的三维价值阐释

□付晶



孝善文化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

应急处突能力是指在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实现对风险的应对、控制与问题解决的综合能力。其重要意义可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进行系统阐释与深度剖析。

应急处突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与民族文明的延续、社会治理的完善深度绑定,直接关系到社会安定、民生福祉乃至文明存续。回顾历史发展脉络,能够提炼出四条历经时间检验的应急治理根本经验,这些经验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新时代提高应急处突能力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理论源头与实践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确立为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将其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框架;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其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原则之一,明确提出发展与安全犹如“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强大的应急处突能力,正是确保“双轮”协调运转、“一体”行稳致远的关键支撑。

应急处突能力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压舱石”,其提升水平直接关系到民族复兴伟业的推进成效,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战略支柱。

应急处突能力是指在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实现对风险的应对、控制与问题解决的综合能力。其重要意义可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进行系统阐释与深度剖析。

历史维度

传承应急智慧,把握历史主动的根基所在

一部中华文明史,既是一部绵延不绝的文明演进史,也是一部与各类灾害风险持续斗争、不断积累应急治理经验的历史。应急处突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与民族文明的延续、社会治理的完善深度绑定,直接关系到社会安定、民生福祉乃至文明存续。回顾历史发展脉络,能够提炼出四条历经时间检验的应急治理根本经验,这些经验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新时代提高应急处突能力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理论源头与实践遵循。

(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应急处突的思想内核与理论前提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治理智慧,《左传》所言“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与《周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古训一脉相承,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防患于未然的治理传统,构成了中国传统应急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继承并升华了这一文化基因,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战略预见能力、底线思维相结合,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质与实践品格。在党的七大召开、抗战胜利在望的关键历史节点,毛泽东同志仍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列出17条可能面临的困难,强调要“准备吃亏”,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战略远见;进入新时代,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这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新时代应急处突工作确立了思想指引与理论遵循。

(二)“民惟邦本”的价值取向:应急处突的根本立场与价值准则

“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价值。《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论述,清晰界定了应急治理的终极目标——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安定有

序。中国共产党将这一传统理念提升至党的根本宗旨高度,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其确立为所有危机应对工作中最高、最鲜明的价值准则,使应急处突工作始终围绕群众需求展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立场,也为应急处突能力的提升明确了价值导向。

(三)“上下同力”的协同思维:应急处突的制胜关键与方法论支撑

团结协作是应急治理的内在要求。《管子·牧民》中“上下同力,其功必成”与《孙子兵法》中“上下同欲者胜”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协同联动在应急处突中的重要作用。新时代以来,我国构建的国家、省、市、县、乡五级联动应急机制,整合党员、新就业群体、志愿服务队等各类力量形成应急共同体,正是对这一传统协同智慧的传承与发展,既符合“统一指挥、上下联动”的现代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要求,也为提高应急处突能力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

(四)“辩证施策”的应变智慧:应急处突的方法精髓与能力核心

中华文化历来强调“预”与“变”的辩证统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凸显事前准备的重要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调事中应变的灵活性。中国共产党将这种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相结合,发展成为卓越的战略谋划和应急处置能力,既注重深入调研、科学预判,下好风险防范“先手棋”;也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法,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复杂危机中寻找转机,练就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过硬本领。这种辩证施策的智慧,为新时代提高应急处突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助力实现应急处突的科学性与灵活性有机统一。

现实维度

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化解风险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确立为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将其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框架;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其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原则之一,明确提出发展与安全犹如“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强大的应急处突能力,正是确保“双轮”协调

运转、“一体”行稳致远的关键支撑。

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网络攻击、科技竞争、极端气候、生物安全等新型风险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呈现出隐蔽性、复杂性、传导性强的特点,极易跨越国界传导至国内,对我国应急处突体系构成全新挑战。从国内发展来看,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发展的关键阶段,发展成就显著,但面临的矛盾与风险也前所未有,同时处于“矛盾凸显期”与“风险高发期”的双重考验。

这就警示我们,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没有安全,发展就失去了根基;没有强大的应急处突能力作为后盾,已有的发展成果也可能因突发风险而受损。因此,提升应急处突能力,绝不是可抓可不抓的“软任务”,而是应对现实风险挑战、守护发展成果、维护社会稳定的“硬要求”,必须高度重视、扎实推进。

未来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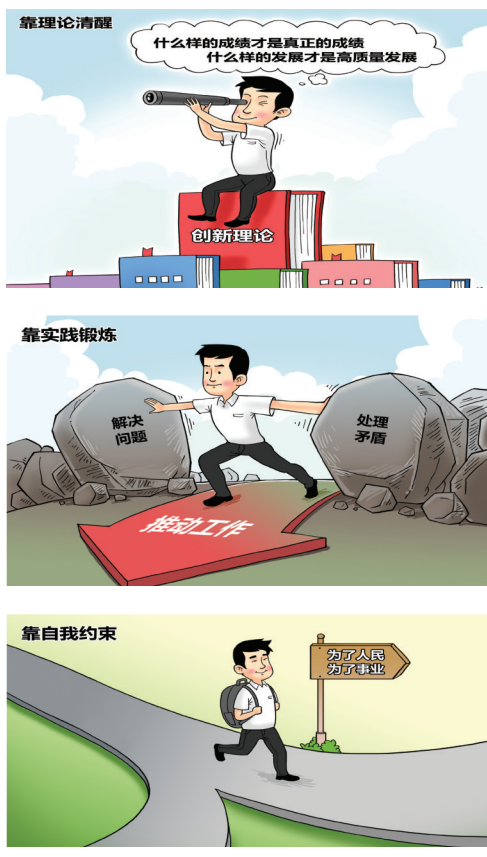
护航民族复兴,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基石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的宏伟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鲜明特征,如此宏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实可靠的安全保障作为支撑。应急处突能力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压舱石”,其提升水平直接关系到民族复兴伟业的推进成效,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战略支柱。

展望未来,民族复兴的征程不会一帆风顺,必将面临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提高应急处突能力,本质上是为赢得未来战略主动进行的核心能力储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这一能力的提升,不仅要求我们能够高效处置已知风险,更要具备洞察潜在危机、防范未知风险的能力;不仅要求我们提升应急处置技能,更要推动构建跨领域、跨层级、跨主体的应急综合治理体系,实现应急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从“单点处置”向“系统治理”转型。

(作者单位:中共招远市委党校)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新时代干部怎么树立正确政绩观?关键有三条。

第一,靠理论清醒。要通过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真正弄明白:什么样的成绩才是真正的成绩,什么样的发展才是高质量发展。

第二,靠实践锻炼。正确政绩观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在解决问题、处理矛盾、推动工作中磨炼出来的。面对难题怎么选,面对诱惑怎么守,面对眼前和长远怎么权衡,这最能检验政绩观。

第三,靠自我约束。很多偏差不是因为不知道,而是因为内心松了、标准降了、初心淡了。要经常问问自己:我做这件事,究竟是为了人民、为了事业,还是为了个人评价、个人得失?所以,从更深层看,政绩观不仅是一种工作理念,更是一种政治品格。它最终考验的是党性、境界和担当。说到底,守得住初心,才能稳得住方向;立得住党性,才能树得正政绩。

新华社发 王威作

让工业遗产“活起来”“火下去”

□史扬帆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见证,是工业文化的载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历史物证,工业遗产是具有社会教育功能的独特旅游资源,科学高效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于传承弘扬特色工业文化、持续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家层面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愈发重视,先后出台多项利好政策,为老旧工业遗址活化利用提供支持,工业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些许瓶颈亟待突破。下一步,应不断完善制度规定和政策措施,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途径,深入挖掘、系统展示工业遗产的价值内涵,全面推动工业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强化系统规划,建立科学长效保护机制。工业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顶层设计,需结合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分类施策,深入挖掘地区特有的地脉、人脉和文脉,将工业遗产物的物理空间转化为文化资本再生产场域,使老空间满足新需求,旧建筑承载新功能,利用工业遗产所蕴藏的多元价值更好地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应综合运用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多种手段,对废弃闲置的工业厂房、矿区和各类场站进行创意策划与配套建设,因地制宜发展以工业遗产为特色的会展经济,支持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文化节、艺术节、博览会、体育赛事等活动紧密结合,常态化举办工业遗产论坛、工业文物交流展及各类特色工业文化体验活动,积极构建以工业遗产为载体的新型文化创意产业链,拓展工业遗产的价值普及和传播推广渠道。另一方面,要紧扣城市更新提质增效目标,将能够凸显工业文化特色的景观标志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精心打造一批主题鲜明的休闲街区、特色小镇公园等,将昔日的传统生产空间创造性改造升级为今日的休闲风景区,将工业遗产有机融入现代居民生活,推动工业遗产实现从“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的精彩蝶变。

立足资源禀赋,创新活化利用渠道。在工业遗产改造利用方面,需结合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分类施策,深入挖掘地区特有的地脉、人脉和文脉,将工业遗产物的物理空间转化为文化资本再生产场域,使老空间满足新需求,旧建筑承载新功能,利用工业遗产所蕴藏的多元价值更好地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应综合运用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多种手段,对废弃闲置的工业厂房、矿区和各类场站进行创意策划与配套建设,因地制宜发展以工业遗产为特色的会展经济,支持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文化节、艺术节、博览会、体育赛事等活动紧密结合,常态化举办工业遗产论坛、工业文物交流展及各类特色工业文化体验活动,积极构建以工业遗产为载体的新型文化创意产业链,拓展工业遗产的价值普及和传播推广渠道。另一方面,要紧扣城市更新提质增效目标,将能够凸显工业文化特色的景观标志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精心打造一批主题鲜明的休闲街区、特色小镇公园等,将昔日的传统生产空间创造性改造升级为今日的休闲风景区,将工业遗产有机融入现代居民生活,推动工业遗产实现从“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的精彩蝶变。

推动产业融合,大力发展特色工业旅游。工业遗产不仅要保有“硬核”的躯体,还要发掘出“文艺”的气质。应按照“传统工业遗产+N”的文化旅游思路,进一步推动传统工业遗产与文化、旅游产业互融互促,持续拓宽和延长工业融合产业链,打造符合当下游客审美与消费偏好的特色工业旅游产品和业态。要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突出地方特色和行业特征,大力升级工业旅游项目建设,支持引导现有的工业旅游点提质增效,强化工业遗产廊道构建,完善配套商业服务功能,实现从单一“回厂游”参观向集沉浸式体验、科技互动等为一体的新型工业遗产文化旅游形式的成功转型。此外,还应深入挖掘精神内核,系统整理传统工业遗产背后的创业故事、红色基因、技术创新等宣传要素,积极开展工业文明教育、红色技术科普、红色教育宣传等活动,研发工业文明教育和工业旅游研学产品,创造性进行工业旅游点的研学课程设计。工业遗产记录着地区发展变化的轨迹,镌刻着人们在此地工作与生活的时代记忆,可将本地工业遗产改造成为城市微度假的核心场域,打造包含精神地标、文化展演、怀旧消费等在内的综合体验场景,将居民的文化认同转化为情感依附,构建起基于本地特色和文旅优势的优质旅游生态。

加强宣传引导,激发全社会参与热情。工业遗产的传承保护活化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应加快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主体协同机制,合力助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再上新台阶。具体来讲,社会媒体要进一步加大对工业遗产多元价值的宣传引导,积极构建官方宣传渠道矩阵,运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实现多点多平台布局,提高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对工业遗产的认知和关注度。在此基础上,还要激发更多人的参与热情,持续优化和拓宽公众参与渠道,赋予公众更多的权利和机会,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要积极探索“工业遗产+社区共创”模式,采用参与式设计方法,重视公众意见的征集和采纳,确保工业遗产活化项目更加契合社区需求和当地文化特色。此外,还要建立透明的决策和监督体系,使工业遗产保护活化的实施过程更加民主、公开。可持续运营是工业遗产活化的关键,要积极探索“公益+市场”双轮驱动模式,探索以未来运营收益权为基础的融资创新模式,为工业遗产活化注入资金活力,对参与工业遗产活化项目的企业给予资金奖励和税收优惠等支持,充分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作为一种文化标识,工业遗产承载着城市工业发展的时代记忆,期待更多工业遗产能够成功融入城市发展格局,真正实现“活起来”“火下去”,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作者单位:中共烟台市委党校)



孝善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因,是中国人理解“老”、对待“老”的精神底色。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孝善文化与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不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而是一种逻辑性的必然。孝善文化与养老服务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叠加”或“包装”,而是一种深层次的“融合”与“互构”。从文化逻辑看,孝善文化为养老服务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道德根基和情感纽带;从社会逻辑看,孝善文化从家庭伦理向社会治理的递进,适应了家庭结构变迁的时代要求;从实践逻辑看,文化嵌入显著提升了养老服务的可及性、亲和力和可持续性。三者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二者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

文化逻辑

孝善文化是养老服务的道德根基与情感纽带

养老服务首先是“人对人”的服务,其次才是“制度对人”的服务。这就决定了任何有效的养老服务体系,都不能缺少道德的支撑和情感的浸润。孝善文化恰恰提供了这种支撑与浸润。

孝善文化为养老服务奠定了道德根基。在中国传统伦理中,“孝为德之本”,孝不仅是家庭内部的私德,更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孝经》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意味着,对老年人的尊重和赡养,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一种根植于人性深处的道德义务。当这种道德义务从家庭延伸到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中时,就构成了养老服务从业者的职业良知和社会公众对养老事业的道德认同。没有这种道德根基,养老服务就容易沦为冷冰冰的交易行为,失去了应有的温度与敬意。

孝善文化为养老服务提供了情感纽带。老年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既有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硬需求”,更有精神慰藉、情感陪伴、社会尊重等“软需求”。制度化养老服务往往擅长解决前者,却难以有效回应后者。原因在于,制度依靠规则运行,而情感依靠认同发生。孝善文化所蕴含的“尊敬”“感恩”“关爱”等价值理念,能够跨越制度与人心之间的距离,成为连接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情感桥梁。当护理人员以孝亲之心对待老人,当社区志愿者以敬老之情参与服务,养老服务就不再是单向的“供给——接收”关系,而成为双向的情感互动与价值实现。

社会逻辑

孝善文化从家庭伦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化

传统社会中,孝善文化的实践主体主要是家庭,赡养老人被视作子女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户人均人口已降至2.62人,家庭小型化、少子化、空巢化等趋势明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大量老年人需要依靠社会化养老服务来安度晚年。这是否意味着孝善文化失去了用武之地?恰恰相反,这为孝善文化从“家庭之孝”向“社会之善”的转化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孝善文化的社会化转化,首要在于将个体道德责任转化为社会责任。传统孝道将养老责任主要赋予子女,这在多子共居的大家庭时代是可行的。但在家庭结构深刻变革的今天,许多子女客观上不具备全天候照护父母的能力,若仍将养老责任完全压在家庭身上,既不符合实际,也容易造成代际隔阂和家庭矛盾。孝善文化的核心精神——尊敬和关爱老年人——并不必然锁定在家庭场域内。相反,它也可以也必须向社会延伸:政府有责任制定敬老政策,社区有责任营造爱老环境,企业有责任开发适老产品,社会组织有责任提供养老服务,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在日常言行中尊老助老。将孝善文化拓展为社会治理,既是对传统孝道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应对老龄社会的必然选择。

孝善文化为多元主体参与养老服务提供了价值共识和行为准则。养老服务涉及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多个主体,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和行为逻辑不尽相同,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就难以形成有效的协同。孝善文化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价值共识:无论哪个主体参与养老服务,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当是“为了老年人好”,都应当体现对老年人的尊重和关爱。这一价值共识能够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壁垒和短期考量,成为凝聚各方力量的精神纽带。同时,孝善文化所蕴含的具体行为准则——如耐心、细致、和颜悦色、将心比心等——也为养老服务从业者的职业操守提供了文化滋养。

实践逻辑

文化嵌入提升养老服务的可及性、亲和力与可持续性

理论上的必然性,最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近年来,多地积极推动孝善文化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为理解二者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生动的经验证据。

孝善文化显著提升了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在广大农村地区,依托孝善文化底蕴发展起来的互助养老、邻里帮扶模式,有效弥补了正规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许多村级养老服务站点虽然设施相对简单,但因为运营者是本村的热心人,服务方式是乡里乡亲的互帮互助,老年人接受度高、参与意愿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互助养老模式,其生命力恰恰来自孝善文化所培育的社会信任和互惠规范。相比之下,一些投入更大、设施更好的养老项目,反而因为“水土不服”而门庭冷落,这充分说明文化适配性对于服务可及性的关键影响。

孝善文化显著增强了养老服务的亲和力。在一些养老机构和社区服务站点,孝善文化不仅体现在标语口号上,更体现在服务细节中。护理人员被要求以“敬亲”之心对待每一位老人,服务内容从生活照料拓展到精神慰藉、文化娱乐、心理关怀,服务方式更注重维护老年人的尊严和自主性。调研数据表明,接受过孝善文化培训的服务人员,其服务对象对服务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说明,文化嵌入能够有效改变服务者的认知和行为模式,进而提升服务对象的体验和感受。

孝善文化显著提升了养老服务的可持续性。养老服务的可持续性面临两个核心挑战:一是成本压力大,二是人才流失。在成本方面,孝善文化的嵌入,期待更多工业遗产能够成功融入城市发展格局,真正实现“活起来”“火下去”,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作者单位: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